

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私说

顾 农

阮籍的政论文流传至今者凡四篇,其中《达庄论》最为重要,此论与他的《咏怀诗》最可互证,与他放达任诞的生活作风亦足以互相发明。但此文的写作时间始终不明,现有之两种比较流行的假说似均不足信。

一说作于甘露四、五年间(甘露五年六月改元景元,259-260)。根据是“高贵乡公于甘露五年五月被害,而观此文首段忧来无端,无可奈何之情绪,今假定作于最后一个之辰年,或不远于事实”^①。

今按,司马氏杀害高贵乡公曹髦,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阮籍的传记材料和作品中均未见有他对此产生忧来无端,无可奈何之情绪者;在此事发生的前后,阮籍都曾在司马氏手下任职,得到相当的礼遇和照顾。阮籍是支持司马氏的^②,所以上述推测恐不足取信。

一说《达庄论》的写作年代“很可能是在竹林七贤‘并居山阳’后回到洛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即在魏嘉平五年(253)前后”^③。

今按,《达庄论》开头明确提到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其时作者“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垒(舜)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莽之洲,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这时有些“缙绅好事之徒”来批评责问他,于是著此论以回敬之。可见文章当作于这样的交锋之后不久。据《尔雅·释天》,太岁在卯曰单阏,太岁在辰曰执徐;然则此文的写作年代当在某一辰年或其稍后。查阮籍一生涉及五个辰年,即:建安十七年壬辰(212,三岁)、黄初五年甲辰(224,十五岁)、青龙四年丙辰(236,二十七岁)、正始九年戊辰(248,三十九岁)和甘露五年/景

①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页。

②详见顾农:《诗史互证与诗心探幽——关于诗人阮籍的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元元年庚辰(260,五十一岁)。陈伯君先生假定在最后一个辰年(260),前文已言其根据不足,那么可以姑且假定在上一个辰年(248),亦即正始九年,再加以推敲求证。

这时正值高平陵之变(正始十年,248)前不久,形势非常微妙紧张,阮籍辞去尚书郎一职,回到故乡陈留隐居,他的《咏怀诗》正写于此时。六臣本《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作者名下李善注引据臧荣绪《晋书》云: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容貌瑰杰,志气宏放。蒋济辟为掾,后谢病去。为尚书郎,迁步兵校尉。籍属文初不苦思,率尔便作,成《陈留》八十余篇。

按阮籍迁步兵校尉是很晚的事情,放在这里叙述显然不当;而将《咏怀诗》原名《陈留》介绍出来则关系非常重大。陈留是阮籍的故乡,高平陵政变以后阮籍仕于司马氏,不在故乡了,据此可以推知这一组的写作时间在高平陵政变之前不久他在故乡隐居之时。

《晋书·阮籍传》载:“太尉蒋济闻其有隼才而辟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馀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据此可知阮籍之为尚书郎在正始十年(249)初高平陵政变以前;其时的同事有王戎的父亲王浑,阮籍非常看好王戎,认为他的水平在乃父之上,而当时“戎年十五”(《晋书·王戎传》)。查王戎十五岁在正始九年(248),似此阮籍与王戎之父王浑同为尚书郎当在正始八、九年间,这时阮籍三十八、九岁。任此职前后隐居于故乡期间,正是阮籍与嵇康、山涛以及几位年轻人结为林下之游之时^①。据此又可知,他应太尉蒋济之辟为其属吏乃在此之前,而不应曹爽之辟则在此后——那已是高平陵之变的前夜,已经风起云涌山雨欲来了。

这时正是曹爽集团达到权力顶峰的时候,司马懿则实行韬晦之计,称病退避,暗中策划大举,两派政治力量暗中较劲,政治局势外松内紧,一触即发,前途莫测,对此阮籍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很是担心,于是主动退出官场,返回故乡,保护自己,同时写了许多诗表达深沉的忧虑。《咏怀诗》其一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里所表达的无可言说的忧愁和哀伤,正与《达庄论》开头所说的“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合若符契。又《咏怀诗》其十六(《文选》卷二十三列为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其十二)云:

^①详见顾农:《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又收入《魏晋风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里的“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与《达庄论》开头所说的“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垒（舜）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莽之洲”云云，又正可以互相印证^①。诗人深感孤独哀伤，无可告语，过去的种种理想全都破灭了。

当阮籍不应曹爽的征辟时，有一位名叫伏义^②的官派文人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信给阮籍，以庸俗化了的儒家思想给予阮籍强烈的批判；阮籍回过一封很冷峻的短信，其中拿庄子的思想和话语自称“鼈娱行潦而群逝”，自己就喜欢这样，“齐万物之去留”，你把那一套大道理收起来吧。这样就把伏义给顶回去了。而《达庄论》中则有“缙绅好事之徒”中的一个急先锋“怒目击势而大言”地指责作者，又批评庄子道：“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徼惑以失贞，而自以为诚者也？”拿庸俗化了的儒家思想来批判庄子，其思路与伏义如出一辙；而作者回答他的意见，就构成了《达庄论》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达庄论》也应当写于高平陵之变的前夜，曹爽集团最为得意而离全军覆灭业已不远之时，亦即正始九年戊辰（248）。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①旧说“徘徊蓬池上”一首为嘉平六年为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一事而作，大误，笔者另有考证，详见《读竹林七贤札记五题》，载《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大象出版社，2009年。